

前言

研究中國翻譯史，無法繞過對譯者的分析。為讀者打開海外窗戶、探蹟異域新知，都得依靠譯者。本書的「探蹟者」即指遊走於不同語言之間的譯者和出版譯著的贊助人。歷史上的譯者、譯家、譯員和通事，都是指代翻譯人員。中國古代佛典翻譯史，就有研究譯者的傳統，如《高僧傳》、《續高僧傳》、《宋高僧傳》編纂，其實就是一系列翻譯僧的傳記。「譯者」的概念略大，應該涵蓋：譯僧；有著名譯作的譯家；主要服務於官方外交機構和活動於外交場合的譯官、口譯者；官方、教會或民間譯書機構中的筆譯者和潤飾者；古代能達異方之志的舌人，即不同民族之間擔任譯員的譯者；近代傳達請謁事務的通事；活躍在商界同時擔任買辦和捐客的翻譯。譯者當然也可分為「外譯中」和「中譯外」兩種，但本書討論的主要是「外譯中」的譯者。

傳統譯論比較忽視譯者的存在，「信」字往往強調了譯者對原作的忠誠，譯者的身份以隱形為佳，即應該亦步亦趨追隨原作者。錢鍾書（1910–1998）曾提出譯者的作用：「譯本對原作應該忠實得以至於讀起來不像譯本。」¹ 法國比較文學家馬·法·基亞（Marius-François Guyard, 1921–2011）較早意識到譯者的主體性：「水準最差的譯者也能反映出一個集團或一個時代的審美觀；最忠實的譯者則可以為人們了解外國文化

1 錢鍾書等：《林紓的翻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4），頁270。

的情況作出貢獻，而那些真正的創造者則在移植和改寫他們認為需要的作品。」²金聖華指出：「譯者在早期雖有『舌人』之稱，卻不能毫無主見，缺乏判斷；譯者雖擔當中介的任務，卻不是卑微低下，依附主人的次等角色。翻譯如做人，不能放棄立場，隨波逐流；也不能毫無原則，迎風飄蕩。因此，翻譯的過程就是得與失的量變，過與不足的平衡。」³隨著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以翻譯家為代表的譯者研究正成為翻譯研究的重要課題，譯者與譯入語文化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重視。

譯者研究應該是分時代的。我們現在對「譯者」的理解，與古代有很大的區別。古代的「通事」所承擔的任務主要是實現雙方口頭的溝通和交流，很少有我們今天所強調的字斟句酌的書面文字翻譯。明末清初耶穌會傳教直至鴉片戰爭之前，很多譯者開始承擔文字翻譯，利瑪竇等甚至非常重視「文字傳教」。不過由於很多傳教士譯者漢語文字能力有限，當時的翻譯仍延續著佛經翻譯時代的特點，多採取「西譯中述」，即外人口譯、中土人筆述的方法，關注的主要不是句子層面的忠實，而突出意思的傳達，最主要的是將原本的內容大意，用漢語表達出來。直至鴉片戰爭之後，譯者才開始尋求如何比較準確地挑選原本和理解原文。以嚴復、顏永京等為代表，中國譯者逐漸開始掌握翻譯的主動權。

翻譯實踐、翻譯文獻、翻譯理論和翻譯思想的研究，離不開譯者，實踐是譯者進行的，文獻是譯者生產的，翻譯思想和理論自然也是譯者創造的。本研究是一個抽樣的定性分析，即將譯者研究融入新知識翻譯史的脈絡，通過若干譯者群體來檢討譯者的地域性，譯者的多重身份、譯者與贊助人的關係、譯者與翻譯文獻學的關係，以及從失蹤的「譯者」到「竊火者」。

2 馬·法·基亞(著)，顏保(譯)：《比較文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頁20。

3 金聖華：《認識翻譯真面目》(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2)，頁15。

一、前行研究

既有的中國譯者的研究大致分為兩類，一是具體的中國譯者傳記的研究；二是中國學者有關譯者的理論探討。20世紀70年代之後，西方翻譯研究開始出現了重要轉折，擴大了翻譯研究的對象，拓展了翻譯研究的範圍。法國結構主義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在1969年的〈作者之職業〉一文中質疑了作者為一切意義源頭的權威，顛覆了翻譯上作者亙古不變的權威地位，認為譯者賦予了靜態文本的開放性和生命延續的空間，譯者的轉換和修改，使原作得到成長、成熟，甚至「再生」。法國思想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1969年更是直言不諱地宣佈「作者死亡」，「文本」是一個多層次的不同文化符號交匯的開放空間。⁴在理論上為譯者走向前台準備了條件。隨著70、80年代以降翻譯文化研究的取向盛行，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主觀能動作用逐漸凸顯，翻譯的主體性漸趨成為國內外翻譯研究重要且頗具爭議的論題，隨之引發的焦點便是有關譯者的討論。意識形態、時代的文化觀念對翻譯的影響都是通過譯者來體現的，而譯者的選擇、翻譯的方式、翻譯的策略等，反過來又折射出特定時代的社會文化語境。要深入、細緻地探討翻譯與譯入語文化的關係，就繞不開對譯者本身的探討。可以說，翻譯研究的轉向，「發現」了譯者，譯家的主體性成為翻譯研究的新課題。⁵

可能是受到傳統人物傳記式研究和西方「譯者」理論的雙重影響，一些關注西方前沿問題、同時也了解傳統的學者開始了新的探索。20世紀80年代初，復刊的《翻譯通訊》便刊登了不少中國翻譯家本人的回憶錄、自傳或他人撰寫的翻譯家傳記，這些均以介紹譯家的翻譯經歷和主要成果為任務。此一時期譯家的傳記式成果紛紛面世，1988年有陳石平、成

4 費小平：《翻譯的政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頁270–271。

5 穆雷、詩怡：〈翻譯主體的「發現」與研究——兼評中國翻譯家研究〉，《中國翻譯》2003年第1期(2003年1月)，頁12–18。

英《軍事翻譯家劉伯承》(書海出版社), 1989年有吳潔敏的《朱生豪傳》(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1992年有高惠群、烏傳袞的《翻譯家嚴復傳論》(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1993年有金梅的《傅雷傳》(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有丁言模的《百年翻譯家傳略——曹靖華》(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等。⁶較為出色的譯者系列研究要推郭延禮的《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 該書下篇討論了梁啟超、嚴復、林紓、蘇曼殊、馬君武、周桂笙、奚若、吳禱、戢翼翬、伍光建、曾樸、陳景韓、包天笑、周瘦鵑、周氏兄弟、胡適、陳獨秀、劉半農等譯者。最早對西方傳教士譯者群體進行系統研究的是顧長聲,⁷其《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來華新教傳教士評傳》(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一書收錄了從馬禮遜(Robert Morrison)、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郭實臘(Karl Gützlaff)、雅裨理(David Abeel)、伯駕(Peter Parker)、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羅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理雅各(James Legge)、晏瑪太(Matthew Tyson Yates)、戴德生(Hudson Taylor)、倪維思(John Livingstone Nevius)、嘉約翰(John Glasgow Kerr)、楊格非(Griffith John)、丁韞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傅蘭雅(John Fryer)、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花之安(Ernst Faber)、謝衛樓(Davelle Sheffield)、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梅子明(William Scott Ament)、李佳白(Gilbert Reid)、卜舫濟(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樂靈生(Frank Joseph Rawlinson)、穆德(John R. Mott)、文幼章(James

6 鄒振環：《20世紀中國翻譯史學史》(上海：中西書局，2017)，頁316-317。

7 顧長聲(1919-2015)，江蘇江陰人，1931年接受基督教洗禮。北京大學肄業，曾任職於中國科學院上海歷史研究所編譯組、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研究所，後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近代史研究室研究員，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及神學院訪問學者等職。有《傳教士與近代中國》、《容閔——向西方學習的先驅》、《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來華新教傳教士評傳》、《馬禮遜評傳》、《喚醒：一位中國歷史學者的回憶錄》(*Awaken: Memoirs of A Chinese Historian*)等著譯多種。參見顧長聲：《傳教士東來傳教恩論文集錦》(台北：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2006)，封二。

Gareth Endicott) 和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 29 位新教傳教士，其中至少有 20 位上都參與過晚清西書中譯，傅蘭雅的傳記中有其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 28 年的譯書經歷，以及在格致書室和益智書會等機構的譯書活動的記述，特別是有一節專門列出其譯書篇目。該書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傳教士譯者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資料線索，即使在今天同類的傳教士譯者群體傳記中仍屬翹楚。⁸ 目前筆者所見最有代表性的譯者研究成果是由方夢之、莊智象主編的三卷本《中國翻譯家研究》(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6–2017)。⁹ 但總體上，譯者的研究主要還局限在歷史人物傳記的範圍，譯者研究沒有作為一個獨立的翻譯史學術分支來加以討論。許鈞主編的《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翻譯研究概論 (1978–2018)》(湖北教育出版社，2018) 一書綜合討論了翻譯學理論、傳統譯論、翻譯史研究、翻譯批評、口譯研究、翻譯職業、翻譯學術出版等諸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惟有譯者研究未專門列目分析，僅僅在「翻譯史研究存在的問題和反思」一節中提出既有的譯史研究中的譯者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數精英譯家，且大多是以文學翻譯為主的名家，在外國翻譯理論的引介部分則介紹了美籍意大利學者韋努蒂 (Lawrence Venuti) 的《譯者的隱形——翻譯史論》(原著 1995 年面世，張景華等譯，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9)，部分文章涉及了女性主義翻譯觀中的譯者主體性問題。¹⁰

以往大部分有關翻譯的討論，主要是集中在譯文上，尤其是有關原著與譯文關係的處理，討論的角度大抵只在確認譯文是否忠實於原著。這很大程度是出於傳統「原著中心」(source-oriented) 的翻譯觀。比利時

8 鄒振環：《20 世紀中國翻譯史學史》，頁 318。《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來華新教傳教士評傳》一書的選題理路很可能得到過同事馬博庵 (1899–1966) 當年提出選題的啟發。參見鄒振環：〈《史譯重鎮》序言〉，載馬軍 (編)：《史譯重鎮：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翻譯事業 (1956–2017 年)》(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8)。

9 該書選取古往今來編者以為最具影響力的翻譯家 94 人。在選目上該書可議之處頗多，很多具有重大影響的翻譯家被忽略了，收錄的譯者傳記質量亦參差不一，若干譯家的傳記缺乏第一手資料的開掘，沒有很大的獨創性，以水濟水問題不少。

10 許鈞 (編)：《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翻譯研究概論 (1978–2018)》(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8)，頁 147–150、197。

籍的美國學者勒菲弗爾 (Andre Lefevere) 和英國學者蘇珊·巴斯奈特 (Susan Bassnett) 提出了翻譯研究「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的主張，強調譯者的主導地位。勒菲弗爾強調翻譯是一個譯者作出抉擇的過程，是譯者來決定把一個文本介紹給特定時期的特定文化時所使用的最有效的策略，對譯與不譯的選擇更多是基於意識層面和詩學層面的考慮。巴斯奈特更是把翻譯看作「譯者擺布文本的一個過程」，原文這一概念本身受到了來自多方面的質疑。¹¹ 兩人的研究凸顯了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作為主體的地位和作用，開始了翻譯研究文化轉向，這一理論的確能夠讓人們轉而審視翻譯與譯入語文化的關係，更好地顯現翻譯的實際功能和效用。不過，即使在所謂文化學派的理論文字裡，也不見對譯者研究的提倡。在中國翻譯研究界，譯者的理論研究在今天仍處於起步的階段，大部分的譯者並未成為翻譯研究的主體對象。

傳統的翻譯理論注重作者和原文本，主張原作是最高權威，譯作應該盡可能與原作相似；並且認為翻譯的價值低於創作，翻譯就是模仿，譯作依賴於原作，缺乏創造性。而譯者作為翻譯過程中最重要的參與者，其創造性長期受到壓抑，一直處於被忽視的邊緣地位。譯者主體性問題在中國學界提出，首先受到了當代西方譯學的影響。大陸學者最早提出譯者的主體性看法的可能是楊武能，1987年他發表的〈闡釋、接受與再創造的循環——文學翻譯斷想之一〉一文中，就提出了譯者的主體性問題，指出翻譯是人的翻譯，而譯者作為一個主體，首先把原著的內容通過自己的語言文字表達出來，同樣也是一種文學創作活動，而譯作、讀者和原著這幾個方面的鏈接點就在於譯者。¹²

2003年，查明建在〈論譯者主體性——從譯者文化地位的邊緣化談起〉一文中提出，譯者主體性是指作為翻譯主體的譯者在尊重翻譯對象的前提下，為實現翻譯目的而在翻譯活動中表現出的主觀能動性，其基

11 袁莉：《文學翻譯主體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9），頁5。

12 楊武能：〈闡釋、接受與再創造的循環——文學翻譯斷想之一〉，載許鈞（編）：《翻譯思考錄》（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頁227。

本特徵是翻譯主體自覺的文化意識、人文品格和文化、審美創造性。¹³ 2015年，賀愛軍完成出版了《譯者主體性的社會話語分析——以佛經譯者和近現代西學譯者為中心》（科學出版社，2015），當中採用了理論思辨和案例分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力求呈現譯者主體性的全景圖；熊兵嬌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完成了《實踐哲學下的譯者主體性探索》（中國書籍出版社，2017），著力從譯者研究對主體與主體性概念的譜系入手，從理論哲學的角度對主體性展開思考。該書以實踐哲學為理論視角，試圖走出理論哲學視角下的觀念世界，超越譯者主體性那種自我、自我意識的主觀理性的窠臼，借鑒馬克思實踐哲學的主體與主體性概念，對譯者主體及其主體性內涵進行重新定位，凸顯譯者作為實踐主體的實踐主體性。越來越多的文獻出現了「譯者的主體性」、「譯者痕跡」、「譯者功能」、「譯者身份」等關於譯者地位的名稱。源語文本的選擇或譯者個人因素等，譯者在翻譯源語文本時留下的創造性並有別於原作的痕跡，即所謂「譯者痕跡」，依照這些痕跡便可以分辨出譯者的目的、個性、風格以及其他特徵。董娜的《基於語料庫的「譯者痕跡」研究——林語堂翻譯文本解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一書主要討論文學翻譯的過程中，由於林語堂採取了不同的翻譯策略，使其在翻譯源語文本時留下了創造性的痕跡，作者以語料庫語言學的工具和方法來描寫、分析和解釋翻譯過程中的譯者痕跡，認為譯者痕跡可以真實地反映譯者在一個時期的翻譯行為，並且可以對某個時期不同譯者的翻譯行為做出合理的解釋。袁莉的博士論文《追尋翻譯的主體》討論作為理解者和詮釋者的譯者主體，採取作為「兩個世界」，即生活和文化兩個世界；「三大主體」，即作者主體、譯者主體和接受主體；「兩類文本」，即源語文本和譯本，來討論複雜的要素之糾合構成統一體的翻譯活動。¹⁴

13 查明建、田雨：〈論譯者主體性——從譯者文化地位的邊緣化談起〉，《中國翻譯》2003年第1期（2003年1月），頁19-24。

14 後經作者修訂，書名改為《文學翻譯主體論》，由上海譯文出版社2019年出版。

對翻譯進程中的編譯者——探賾者的考察，可以採用不同的方法，最為通常的研究，即考察作為個體的譯者。由於翻譯史研究中面對浩如煙海的史料，並不是所有發生過的翻譯事件、譯者等都值得重新挖掘出來探究，「歷史上的翻譯家舉不勝舉，我們為什麼要選擇研究此一譯家，而不研究彼一譯家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研究此一譯家，或研究某一譯本，或某些翻譯事件，會帶出某種學術意義，所以我們才花時間和精力去研究它」。¹⁵ 學術意義的大小往往取決於譯者個體翻譯成就的大小，因為我們研究某一譯者並不只是僅僅為了回顧其個人的翻譯歷程，展示其譯介成果，更是為了探究其翻譯思想和翻譯策略形成的原因，以及在特定社會歷史文化脈絡下是否具有代表性，是否有助於總結某一階段翻譯活動的共性和規律，深入探討其對不同文學、文化間的溝通交流和互鑒產生的影響。

既有的譯者研究考察單個譯者的居多，涉及共同從事這一活動的一類人或一群人的譯者群體的成果偏少。譯者群體是譯史脈絡中譯者研究中不容忽視的重要維度，如王宏志自2010年前後開始潛心研究翻譯在近代中英外交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挖掘出大量珍貴史料，涉及李葉榮、鮑鵬、王韜等在這一時期從事翻譯溝通工作的中國通事群體。他計劃撰寫的《天朝的譯者：從李葉榮到張德彝》一書，將「傳統天朝思想下的蠻夷觀作為整個研究的框架，貫串一系列個別譯者或譯者群」，並在此基礎上考察「天朝思想對譯者及翻譯行為的制約，以及明末以來中西交往的譯者怎樣以一個文化現象作出集體性的回應」。¹⁶

修文喬〈鴛鴦蝴蝶派譯者群體考察——以民初通俗小說期刊《禮拜六》為中心〉一文首先從這一譯者群體聚合網絡的形成入手，考察其鮮明的群體特徵，然後以鴛鴦譯者群體在民初大受歡迎的通俗小說期刊

15 鄒振環、周慧、許磊：〈譯史研究的「蟲眼」與「鳥眼」——鄒振環教授訪談錄〉，《東方翻譯》2020年第2期（2020年4月），頁62-69。

16 王宏志：〈作為文化現象的譯者：譯者研究的一個切入點〉，《長江學術》2021年第1期（2021年1月），頁87-96。

《禮拜六》的翻譯書寫為依據，繪製了這一群體在《禮拜六》的翻譯圖像。¹⁷ 王相博〈譯者行為視域下的「厚翻譯」現象研究——以清末民初時期譯者為例〉一文試圖從譯者行為視域下來重新審視清末民初譯者群體的所謂「厚翻譯」現象，即通過各種註釋將文本放置到一個更加豐富的文化和語言環境裡，通過對清末民初時期社會背景的闡述分析，從譯者群體的角度切入，結合翻譯內外，界定「厚翻譯」譯者的學者型譯者或譯者型學者身份，進而全面和客觀地對譯者行為和譯文質量進行評價。¹⁸ 袁麗梅〈譯史框架下的譯者群體研究：對象、意義和路徑〉一文嘗試回答何為譯者群體研究、譯者群體研究為何以及如何進行譯者群體研究三個問題。文章認為譯者群體研究既涉及知名譯家構成的譯者群體，也不能忽視籍籍無名的譯者。¹⁹ 王潤澤〈無名者的分量：《清議報》早期東文譯者研究〉一文以《清議報》為個案，考證了清末一批報刊東文譯者群體，並勾勒其知識生產的歷史社會脈絡。²⁰

或有研究從區域分佈的角度討論譯者，如林本椿的《福建翻譯家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陳秀主編的《浙江省譯家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溫中蘭等編著的《浙江翻譯家研究》（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0）、李同良的《嘉興翻譯家研究》（九州出版社，2013）等。賀愛軍在參與完成《浙江翻譯家研究》的基礎上，還與其他學者合撰了〈宋明時期譯者的地理分佈規律索隱〉一文，藉助人文地理學視角對宋明時期的譯者構成及其數量變化進行考察，獲得該時期譯者地理分佈的相關數據，由此劃分出絲路地帶譯者、譯館及譯經院譯者與文化中心區譯

17 修文喬：〈鴛鴦蝴蝶派譯者群體考察——以民初通俗小說期刊《禮拜六》為中心〉，《東方翻譯》2014年第5期（2014年10月），頁21–27。

18 王相博：〈譯者行為視域下的「厚翻譯」現象研究——以清末民初時期譯者為例〉，《翻譯論壇》2014年第2期（2014年6月），頁89–94。

19 袁麗梅：〈譯史框架下的譯者群體研究：對象、意義和路徑〉，《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2022年第4期（2022年11月），頁143–150。

20 王潤澤：〈無名者的分量：《清議報》早期東文譯者研究〉，《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3期（2023年5月），頁105–117。

者等不同譯者群體。²¹ 他還從形象學角度討論譯者，如〈晚清至「五四」的譯者形象變遷及其緣由探源〉梳理了晚清至「五四」之間譯者的形象並探究譯者形象形成及其轉變的社會與文化緣由，都有嶄新的角度。²²

翻譯研究是學界對理論最為敏感的領域之一，其間還有更多的成果是從接受美學的角度看譯者的作用，指出傳統譯論中譯者所處的邊緣地位，其作用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隨著翻譯研究的深入，譯者的地位凸顯，而接受美學則十分強調讀者的能動性，文本只有經過讀者的閱讀才有意義，重視譯者作為譯本的第一讀者，類似的研究有蘭州大學、蘇州大學、內蒙古大學、內蒙古師範大學、中國海洋大學等校的學位論文。

譯者和譯作的討論不能停留於譯者及其譯作內容的簡單羅列，或僅僅在指出譯作與原作的關係以及從文字層面去進行陳述，一種語言不僅是簡單的詞彙集結，同時也是一種思維、想像和看待世界的方式，從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人們在觀念組合、心理建構和理性思考方面各不相同。譯者研究很大程度上需要放到譯入語文化所產生的影響之脈絡中進行比較分析，將譯者的翻譯活動和思想演變放入整個譯入語文化大背景之下來論述，藉助譯入語文化元素來解釋某一位譯者或一群譯者的翻譯活動，是翻譯研究自「文化轉向」以來最常見和流行的研究模式，唯有如此，才能對個別譯者或譯者群體及其翻譯活動有更深入的分析。

迄今譯者研究的廣度已經有了明顯的拓展，可惜譯者研究的重點仍在文學翻譯領域，而非文學翻譯領域的譯者較少受到學界的關注。既有的研究實況是文學譯者的研究成果相對較多，如林紓、魯迅、梁實秋、胡適、周作人、徐志摩、郭沫若、茅盾、冰心、瞿秋白、聞一多、卞之琳、朱湘等，而非文學譯者的研究，除了嚴復之外，就顯得非常薄弱，如本書重點討論和涉及的孫中山、王國維、奚若、葉瀚、薩端、沈紘、

21 賀愛軍、侯瑩瑩：〈宋明時期譯者的地理分佈規律索隱〉，《上海翻譯》2020年第2期（2020年4月），頁68-73。

22 賀愛軍：〈晚清至「五四」的譯者形象變遷及其緣由探源〉，《外國語》2015年第3期（2015年5月），頁83-90。

張聞天、馬君武、李達等，而近代來華傳教士的譯者，即使在非漢語系統的此類成果，亦屈指可數。而要對譯者、譯群進行深入的研究，又不得不將之與贊助者，即出版機構結合，視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如「小說林社」的翻譯社群中所出現的曾樸、徐念慈、丁初我、黃摩西、奚若、沈伯甫、蔣維喬、許指嚴、吳步雲、唐海平、周桂笙、包天笑、楊紫麟、謝慎冰、徐卓呆、李涵秋、王蘊章、馬汝賢、陳彥、任墨綠、吳江大愛、吳江弱男、謝忻、盧達、華兮、林蓋天、吳釗、李叔成、稽長康、章仲謐、章季偉、冉涇童子和曾季肅33位江蘇譯員，其中有些算是那一個時期的著名譯家，但約有三分之一強的譯者，甚至留在譯史上的僅僅是一些筆名，至今難以考見其生平。而像梁啟超、黃摩西、王蘊章這樣的名家，其非文學的譯著，如歷史傳記、地理遊記、辭典編譯等，學界的研究亦遠遠不夠。

既有的譯者研究處於起步的階段，基本上還屬於譯者的生平研究，至於如何將生平、譯作和譯論等結合起來，仍然需要研究者進一步開掘第一手的文獻。以譯者為中心，同時還需要新的角度，不能僅僅停留在對個別譯者及其活動本身的理解。如果每位獨立個體的譯者完全被孤立起來，不能與其他譯者和翻譯活動建立關聯互動，仍然不是好的譯者研究；要設法把譯者放置於譯入語文化內，展現其在譯入語文化中的位置和角色。一些從地域文化角度討論譯者的研究，尚未真正寫出翻譯的地方特色。本書考察的譯者，除了來華外國傳教士，如謝衛樓、傅蘭雅，以及中國譯者如孫中山、梁啟超、王國維、奚若、馬君武、李達；也有對譯者群體的分析，如「小說林社」江蘇翻譯群體、金粟齋譯書群體、南通翰墨林印書局等，「小說林社」江蘇翻譯群體的研究，還可以從一個地域文化角度進行切入。

在近現代翻譯出版史上，譯者世家也是譯者研究的一個重要的方面，這一點目前卻很少受到重視。譯者世家大致可以分出父子譯家和兄弟譯者。本書討論的來華傳教士馬禮遜父子並非譯者世家的罕見例子，江南製造局翻譯館中的徐壽（1818–1884）、徐建寅（1845–1901）和徐華封

父子，都是著名的科技譯家；頗具影響力的還有顏永京(1838–1898)、顏惠慶(1877–1950)父子；民國時期創辦真善美書店的曾樸(1872–1935)、曾虛白(1895–1994)父子，也是出色的文學翻譯家；兄弟譯者有華蘅芳(1833–1902)、華世芳(1854–1905)；以及梁啟超(1873–1929)、梁啟勛(1879–1965)等。伍光建(1867–1943)父子一門則出現了伍周甫(1896–1980)、伍況甫(1898–1978)、伍蠡甫(1900–1992)多位譯家，則屬罕見。譯書傳家作為一種譯者世家文化，包括價值觀、創新意識等多方面深層次的思維觀念和生活方式。²³

最早注意贊助人與中國翻譯之間關係的是王宏志的《重釋「信達雅」——二十世紀中國翻譯研究》(東方出版中心, 1999)一書，之後他還通過對晚清林則徐、奕訢和吳汝綸等贊助活動的研究，為清末翻譯史上的贊助人研究作了重要的示範。²⁴近年來關於贊助人與晚清譯述之間關係的論文似乎不少，如陳麗〈從晚清譯介看贊助人對翻譯選材的操控〉；²⁵李奇志〈「贊助人」對晚清翻譯活動的影響〉；²⁶王湛〈晚清翻譯的贊助問題〉²⁷；趙亮〈從安德烈·勒菲弗爾的理論看清末民初偵探小說的翻譯〉；²⁸涂兵蘭〈清末贊譯關係考察〉；²⁹李茜〈從安德烈·勒菲弗爾的

23 譯書之家屬於文化家族的一類，亦是血緣、地緣、學緣三種人際紐帶相糅合的交點，目前學界在西學東漸背景下研究文化家族最出色的成果當推羅元旭的《東成西就：七個華人基督教家族與中西交流百年》(香港：三聯書店, 2014)。

24 王宏志：〈權力與翻譯：晚清翻譯活動贊助人的考察〉，載氏著：《翻譯與文學之間》(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1)，頁44–82。

25 陳麗：〈從晚清譯介看贊助人對翻譯選材的操控〉，《黃山學院學報》2007年第2期(2007年4月)，頁144—146。

26 李奇志：〈「贊助人」對晚清翻譯活動的影響〉，《新鄉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21卷第7期(2007年7月)，頁85–87。

27 王湛：〈晚清翻譯的贊助問題〉，《安陽師範學院學報》2008年第1期(2008年2月)，頁118–120。

28 趙亮：〈從安德烈·勒菲弗爾的理論看清末民初偵探小說的翻譯〉，《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2009年10月)，頁359–360。

29 涂兵蘭：〈清末贊譯關係考察〉，《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2012年5月)，頁86–90。

理論看清末民初偵探小說的翻譯)；³⁰張富榮〈從清末民初的翻譯趨向看贊助人對譯介活動的操控〉；³¹其中多數論文係以勒菲弗爾的贊助人理論來套用晚清的若干譯書資料，皮相之談頗多。

二、書名釋義

「譯道」有幾層意義，一是譯者的翻譯之路，如金聖華的《齊向譯道行》；二指翻譯的歷史過程，也是本書書名「譯道」的意思，兩者自然屬於形而下之意。思果《譯道探微》(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2)是一本譯者講述翻譯史、翻譯方法和實踐的讀書筆記，道盡翻譯之路上的甘苦，所揭示的就是上述兩層意義。更深一層的意義則首先由許鈞在《譯道尋蹤》一書中提出，即從理論意義上闡發形而上的翻譯之道：「其為大道，探討的是關乎何為譯、為何譯、如何譯之背後起著無形重大作用的一切」。³²金聖華既把自己的翻譯之路視為「從鄉間小徑到通衢大道」；³³同時又將其翻譯之道概括為「中庸之道」。她自述：「我們必須採取中庸之道，不能譯得太死，不能譯得太活，要恰到好處，拿捏分寸，依上文下理揣摩語境，才能下筆」。³⁴基於「譯道」所具有的形而下和形而上的雙重意義，金聖華又編了論文集《譯道無疆》(浙江大學出版社，2020)。

「探蹟」有尋蹤的意思，但較後者更為深奧。該辭取自《周易·繫辭上》：「探蹟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唐初孔穎達註曰：

30 李茜：〈贊助人對翻譯活動的操控——以江南製造局翻譯館為個案〉，《遼寧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2012年12月)，頁42-44。

31 張富榮：〈從清末民初的翻譯趨向看贊助人對譯介活動的操控〉，《河南科技學院學報》2012年第9期(2012年9月)，頁83-85。

32 許鈞：《譯道尋蹤》(鄭州：文心出版社，2005)，頁1-3。

33 金聖華：《齊向譯道行》(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自序。

34 白立平：〈譯道道譯：金聖華教授新著《齊向譯道行》評介〉，《東方翻譯》2011年第5期(2011年10月)，頁93-94。

「探，求取；蹟謂幽深」。³⁵《周易·繫辭上》中還有：「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蹟，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³⁶「蹟」字，孔穎達又解作「幽深難見」，而宋代朱熹進而釋為「雜亂」之意。實際上「幽深」、「雜亂」兩者是相通的，天下之事物所蘊藏的性質、規律和原理，正是因為隱藏在事物的背後，所以幽深奧妙，凡人無法體認這種高深複雜的性質，表面上即顯示出種種的複雜和混亂。聖人觀察天下奧妙幽深，而透過眾多繁雜事物的表象，探知其中深奧的內涵和規律。「探蹟索隱」，即探究深奧的道理，搜索隱秘的事情。

清末民初的「探蹟者」正是在「譯道」上不斷搜隱探秘、創造新譯品的譯者，探究譯壇譯者的奧秘，便於我們得出一種接近具體事物的新見解，即所謂「擬諸其形容」，然後根據想像，再用自己的方法，將這些事物描繪出來。這一「探蹟」的過程，不是頗像譯者在「譯道」——翻譯史——中探尋翻譯隱秘、創造新譯品的過程嗎？譯者和贊助人當然不是聖人，也無法「以定天下之吉凶」，但在史林譯海之中的探蹟者，卻能夠不斷梳理「複雜」和「混亂」的表象，探索其間的「幽深奧妙」。

三、本書結構

全書共分12章。第1章〈馬氏譯家：馬禮遜父子與《外國史略》〉：《外國史略》是早期一部西洋人譚西洋的重要著述，也是魏源百卷本《海國圖志》所引用的兩部外人史著之一，其中所引用分量僅次於《地理全志》和《四洲志》。由於該書僅僅是流傳在「粵東」的手稿，目前學界是依靠《海國圖志》才得以了解該書的基本內容。關於該書的作者至今眾說不一，筆者從該書的內容、選材、結構與特點的分析入手，從而導出了關於作者的分析思路，提出該書是馬禮遜父子先後接續完成的一部世界史。

35 孔穎達：《周易正義》，載阮元（編）：《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影印本），頁82。

36 同上，頁79。

第2章〈別創新構：謝衛樓的《萬國通鑑》與晚清史書編纂體例從傳統到近代的轉變〉：史書編纂體例是對歷史如何進行組織安排的一種形式，是中國史學史研究的重要方面。晚清是史書編纂體例發生重要轉變的時代，最關鍵的變化是引入了章節體。以往學者在討論章節體史書時，或以為該體例是傳統紀事本末體的邏輯發展，或認為是以日本東洋歷史教科書為藍本的。在晚清史書編纂體例變化的過程中，事實上存在著一個由卷章段體到章節體轉變的過程，其中有諸多轉變的環節。本章認為最早的卷、章、段合成的史書體例是出現在19世紀80年代引進的外國史書體例中，其中第一環節為美國傳教士謝衛樓編譯的《萬國通鑑》，該書卷章段體例是影響後來章節體史書的一個重要過渡，是最為接近於後來章節體的史書之一，為國人接受日本學者以章節體所編纂的中國通史作了重要的鋪墊。第二環節為上海東文學社贊助出版的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和桑原鷺藏的《東洋史要》，兩書引入了較為成熟的章節體史書體例和較早採用了歷史分期法，第一次向中國人展示了一種編寫中國歷史教材的嶄新形式，即不僅可以章節體的形式，而且以歷史時期劃分來還原中國歷史的本相。中國史家柳詒徵和夏曾佑等在重新思考和改造傳統史書編纂形式的過程中，都直接或間接地借鑒了日本章節體中國通史的形式。

第3章〈革故鼎新：傅蘭雅編纂的譯書書目〉：傅蘭雅在中國近代譯史上是值得大書特書的翻譯家。他在譯書書目編纂方面貢獻卓著，但將其《譯書事略》、《益智書會書目》聯繫起來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至今尚無專文討論。本章通過傅蘭雅編纂譯書書目的分析，以及關於知識分類的解讀，從傳統知識分類向現代轉型的語境出發，指出其中「官書局目錄」代表的《譯書事略》和「教會書局目錄」代表的《益智書會書目》，是中國傳統知識分類現代轉型，即所謂革故鼎新的重要一環，在中國近代知識分類轉型史上所具有的「典範」意義。

第4章〈施救濟人：孫中山編譯的紅十字會救傷教科書〉：孫中山的研究成果在學界堪稱汗牛充棟，但關於孫中山所編譯的一部紅十字會救

傷教科書《紅十字會救傷第一法》，卻仍未受到研究者的足夠重視。本章在前賢整理該譯本文獻和研究的基礎上，對「紅十字會」譯名和孫中山所譯《紅十字會救傷第一法》的初版與再版，以及該書的影響等問題，作了初步的研究。作者指出孫中山是第一次將「紅十字會」一詞用於漢文譯著書名的中國人，《紅十字會救傷第一法》是華文世界第一部關於紅十字會的書籍，也是漢文文獻中第一部紅十字會救傷的教科書。該書不僅在中國紅十字會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而且也是孫中山「博愛」思想的具體顯現，對於中國近代翻譯出版史、醫學史和文化交流史，中國近代醫學教科書編纂史的研究，都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第5章〈區域譯群：「小說林社」江蘇翻譯群體及其構成之特點〉：區域譯群指以翻譯異域文化為目的，經由特定的譯者群體在某一特定地域範圍內所進行的一種帶有地域特色的翻譯活動。參與「小說林社」翻譯活動的30多位江蘇譯者，屬於江蘇地區的譯者群體，他們以共同生活的空間構成了地緣關係，以家鄉親朋組成鄉緣關係，以學堂師生同學形成學緣關係，這些譯者群體構成一種有效的社群互動模式，以曾樸、徐念慈、丁初我為核心，聚集了一大批江蘇的翻譯人才，「小說林社」儘管持續僅四年餘，但前後出版了近150種小說，其中翻譯小說多達107種，每年生產20多部翻譯小說以及一批教科書譯作，不能不歸功於這一有效的文化關係網的建構。由江蘇譯者為主體構成的「小說林社」特殊的譯者群體，其共同特點是大多受過傳統文化的熏陶，或有較好的傳統學問的基礎，有的還直接參加過科舉，中過秀才或當過舉人。但大多都有過仕途上不順利的經歷，即使有功名，與他們自負的才氣相比，仍會有懷才不遇之感。這批江蘇譯者利用自身所承受的傳統素養和在新式學堂或留學時期所獲得的雙語優勢，成了20世紀初小說翻譯、教科書編譯，乃至文化傳播中的一支勁旅。

第6章〈小說史傳：廣智書局及其刊行的梁啟超譯著〉：作為廣智書局靈魂的梁啟超，將日本翻譯的歐美小說史傳作為該書局翻譯出版的重要思想資源，並以對日本西學的全新認識來組織和處理翻譯出版的選

題。廣智書局前後持續十多年，其出版的譯著具有明顯的學術特點和相當廣泛的社會影響。梁啟超將自己通過小說改革社會的想法貫徹在廣智書局的出版過程中，致力於通過翻譯小說史傳作為開拓國民視野和構造救國救民政治理想的工具。從小說史傳翻譯題材選擇上，梁啟超主要考慮的是如何讓小說史傳切合於政治時局的需要，選擇《佳人奇遇》似乎有偶然的因素，但爭取國家的獨立和自由是梁啟超選擇翻譯的首要考慮；選譯《十五小豪傑》固然有提倡冒險鬥爭的精神，同時也是通過該書來宣揚立憲自治的政治思想和啟蒙意識。《俄皇宮中之人鬼》一方面是對「生殺與奪，一在其手」的俄皇專制體制的抨擊，同時也是一種對舊日維新變法的懷念。在清末救亡圖存的危機時代，以域外資料編譯建構了晚清英雄和英雌的新系譜，後人總結梁譯史傳有擅長結構、文辭明淨中有波瀾且頗富陽剛之美、記述與議論交錯、寫人物重個性及氣概、有浪漫主義的風格等特色。論者忽略了這些傳記依據原本的影響，其傳記得益於日本《太陽》、《國民之友》和《國民新聞》等數量眾多的期刊所提供的各種英雄和英雌史傳，使得梁啟超在輾轉編譯過程中，設法通過新傳記載體抒發個人的感懷，寄託自己的改革理想。作為贊助者的廣智書局在清末政治變革的過程中，通過推出以梁譯史傳為代表的介紹西方英雄和英雌史傳的新形態，有效地給國人帶來了新思想和新觀念。梁譯的這些小說史傳藉助廣智書局而廣泛流傳，改變著時代的思想和風貌，在編譯史傳的過程中，梁啟超扮演著作為讀者、譯者和作者的多重角色，由於他的思考與許多同時代的閱讀者的思考有著強烈的共鳴，他所編譯的小說史傳有著凝集一個時代思考縮影的意義。

第7章〈贊助新學：上海金粟齋的譯書及其影響〉：「贊助人」是翻譯理論家勒菲弗爾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已被學界廣泛延伸至社會的文學系統研究之外。贊助人的問題，或可追溯到中國古代，皇家和達官貴人往往在學術上會扮演一種「贊助人」的角色，如康熙皇帝就是清初西學翻譯活動的重要贊助人。贊助人可以是個人，也可以通過建立一些機構實體。這種風氣延續到近代，近代書坊或新式出版機構也是非常典型的

贊助人。本章通過作為贊助人的蒯光典與南京金粟齋、在上海設立的「金粟齋譯書處」始末、嚴譯《穆勒名學》「部甲」的譯刊及其影響、金粟齋譯書處刊行的葉瀚譯的《泰西教育史》和沈紘譯《日本憲法義解》等史學譯著，以及傳輸的法學新知識，從贊助人的角度切入，全面分析了南京金粟齋的來龍去脈、上海金粟齋譯書處的創辦始末，以及該社出版物在清末新知識傳播過程中的作用。指出金粟齋譯書處的新學譯著，為傾向新知、求西學的文人學子提供了新知識、新思想和新語彙，也為20世紀頭十年上海西學新知識的進一步傳播，為新形態的翻譯出版的贊助人提供了重要的經驗和示範。

第8章〈翰墨詮史：張謇與清末憲政史知識的譯介與傳播〉：20世紀初年在仿效西方和日本實行立憲改革這一點上，中國的官方和民間已經取得了基本的共識，但中國的立憲道路應採取「虛君立憲」的英國模式還是「實君立憲」的日本模式仍然意見不一。張謇沒有明確提出過中國的立憲政體究竟應該採取「英國模式」抑或「日本模式」，而是在其主持下的翰墨林書局首先將《日本議會史》和《英國國會史》譯成漢語，將兩種模式的憲政知識傳輸給國人。從對作為西方立憲政治源頭、典範的英國憲政歷史模式，到作為東方仿行憲政成功典範的日本憲政歷史模式的考察，以及對憲政思想和實踐的中學源流的研究，構成了清末對憲政思想及其歷史的相對完整且多視角的認知體系。正是在翰墨林書局主持人張謇的贊助下，清末有關憲政與憲政史譯著的相繼詮釋問世，不僅為近代中國的憲政理論的建構和實踐的運作，提供了豐富的知識資源，而且啟發和帶動了清末憲政史一波又一波的譯刊高潮。

第9章〈譯、學之間：王國維所譯法學、地理學和心理學著作〉：翻譯與學術研究貫穿了王國維的一生，其譯作涉及哲學、邏輯學、倫理學、心理學、法學、地理學、歷史學、農學、動物學、教育學、海外漢學等多種領域，但由於王國維一生學術研究的巨大成就，使他作為譯家的身份漸漸被人遺忘了。本章所討論的是20世紀前十年間王國維所譯有關法學、地理學和心理學的重要譯著，一是在1901年金粟齋譯書處

推出的日本磯谷幸次郎的《法學通論》，二是商務印書館印刷、金粟齋譯書處發行的中村五六編纂、日人頓野廣太郎修補的《日本地理志》，三是由王國維通過日文譯出的元良勇次郎的《心理學》和通過英文本轉譯的丹麥海甫定《心理學概論》，並指出王國維的譯作為所在領域創造了大量至今仍在沿用的專業術語，這些譯作與其學術研究之間形成了積極的互動關係。

第10章〈譯連「神燈」：奚若與《天方夜譚》〉：《一千零一夜》即《天方夜譚》，是國人最早認識的阿拉伯文學，早在19世紀40年代，中國讀者就通過收入《海國圖志》的《四洲志》中的簡短文字知曉了《一千零一夜》。該書離奇突兀的情節和神奇瑰麗的想像，通過1900年周桂笙的若干節譯，有了初步的認識，但1903年出版的《新庵諧譯初編》畢竟收入的還只是一部分譯文，算不上《天方夜譚》的單行本。而奚若才是清末以《天方夜譚》為書名譯出這本著名阿拉伯民間故事集的第一位翻譯家，奚若譯《天方夜譚》堪稱清末第一個漢譯的單行本。整個20世紀的一百年間，《天方夜譚》的中譯本或與之有關的書林林總總多達464種，尚未計算其未考查到的一部分，堪稱外國文學作品中漢譯版本最多的一部著作，奚若譯《天方夜譚》在清末「譯道」上獨具一格，具有長久的影響力。

第11章〈濟世六書：馬君武《國民生計政策》譯本述論〉：馬君武精通英、法文和德文，是近代中國繼嚴復之後傳播西方學術，翻譯西方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著述層面成績最著的翻譯家。將馬君武和嚴復並稱為是中國近代傳輸西學上的翻譯雙雄，並非溢美之言。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馬君武漸漸進入了譯史研究者的視野，馬君武一生的翻譯活動涉及文學、哲學、經濟學和自然科學諸多領域，其學術翻譯的體系也極為龐大，本章擬從馬君武之翻譯奧地利菲里波維政治經濟學「濟世六書」，來觀照馬君武學術翻譯的另一個面相。

第12章〈「馬學」新考：李達及其馬克思主義讀本「第一譯」〉：李達在翻譯馬克思主義讀本的「馬學」系譜中，是最早在日本翻譯《唯物史觀解說》、《社會問題總覽》、《馬克思經濟學說》三書，亦可以視為他翻譯

馬克思主義讀本的「前三譯」。而作為「第一譯」的是1920年編入中華書局「新文化叢書」的《唯物史觀解說》，雖然在李達輸入馬克思主義著述諸譯本方面影響甚大，但卻很少受到研究者的重視，早期的郭湛波是如此，近期的著述亦是如此。本章重點討論作為李達的馬克思主義讀本「第一譯」的《唯物史觀解說》，並就學界關於李達所譯《馬克思經濟學說》是否正式出版且為李大釗推薦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疑問。

以上十二章，每章都有小結，而全書的結語並非十二章研究的總結，而是從將譯者研究融入新知識翻譯史的脈絡、譯者的地域性、譯者的多重身份、譯者與贊助人、譯者與翻譯文獻學的關係、失蹤的「譯者」到「竊火者」等六個方面，重點闡述本書作者有關如何從時代的大背景和譯入語文化脈絡來研究譯者的一些想法。

筆者多年研究近代中國史學史和中外史學交流史，對史書體例有著濃厚的興趣，翻譯史同樣可以有不同的書寫方式，如可以譯作為中心來撰寫翻譯史，1996年完成出版的拙著《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即從譯作和譯品賞析的角度來考察中國翻譯史，不失為研究翻譯史的一個特殊的視角，³⁷即以譯者為中心來撰寫翻譯史。歷史活動的中心是「人」，譯者作為人物研究，較之翻譯事件和譯著更具對話性和闡釋性，譯者是翻譯史演變的核心，中國傳統史學有著注重「人」的傳統，所謂「紀傳體史書」就是以人物為中心來建構歷史的典範。翻譯史的編纂，離不開譯者、譯論、譯作和譯事幾大要素。譯事，即翻譯活動，不僅包括翻譯實踐活動的本身，也包括參與翻譯活動的譯者及其譯論、譯作；譯作是譯者文化協調的產品；譯論是譯者闡釋翻譯實踐活動的衍生物。正如研究者所指出：「如果說譯作是建築，那麼譯者就是建築師，要研究建築，就不能無視建築師的存在。」³⁸譯者從來就不是簡單的語言解碼器，在跨文化交流的交接點上，譯者是文化時空的旅行家，扮演

37 鄒振環：《20世紀中國翻譯史學史》，頁312-316。

38 熊兵嬌：《實踐哲學視角下的譯者主體性探索》（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6），頁197。

著文化協調人的角色，既是文化的傳遞者，也是文化的解釋者。一部中國翻譯史，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一部譯者及其重要譯作的編年錄。譯者研究理所當然是譯史研究的主體，翻譯文本的選擇、翻譯事件和譯本的形態，離開了譯者群體，譯史研究的深入拓展就無從談起，而本書當然算不上是一部以譯者為中心的近代翻譯史，但筆者確實有意嘗試通過這些譯者和譯者群體的研究，來完成一個時代的譯者專題史。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